

王充哲学思想新探

周桂钿

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21 6754 6

王充哲学思想新探

周桂钿

河北人民出版社

829501

30114/11

王充哲学思想新探

周桂钿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8·625 印数182,000册 册数：1—3,25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86·100 定价：0·80元

序

儒家学派创于孔子。孔子以后经孟轲、荀卿、董仲舒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到了东汉是儒学宗教化的时代。由于汉光武帝刘秀以图谶兴起，他即位以后崇信谶纬，用谶书来决定一切疑难问题。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谶纬在东汉号为“内学”，尊为“秘经”，具有神学法典的性质，谶纬神学成为东汉的统治思想。自此以后，儒者尊学图谶，凡是善于附会图谶的就能得官，反对图谶的就会得罪。范蔚宗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郑范陈贾张传论》）

王充是汉代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生在谶纬神学迷雾笼罩的鸟烟瘴气之中，却能不随俗浮沉，保持清醒的头脑，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对于谶纬中的感生、受命、生知、灾异谴告、五行相害、吹律定姓以及祭祀鬼神等汉代从上层社会到民间流行的各式各样的迷信都加以批判。在批判神学迷信的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论衡》八十五篇（今缺《招致》一篇，存八十四篇），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哲学之林也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唯物主义哲学巨著。在谶纬中，孔子成了教主，把经学变成神学，把六经当成占验书（六经纬均属占验书）。王充认为，孔

子不过是“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论衡·本性篇》）。他写《问孔篇》把孔子还原为人，又说：“知经误者在诸子。”（《论衡·书解篇》）并不认为经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王充“疾虚妄”的理论武器就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王充说，《论衡》的写作动机是“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论衡·对作篇》）所以王充《论衡》总的精神就是“实事疾妄”（同上）。“实事”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疾妄”就是反对一切虚妄和浮夸。王充写下“九虚”（《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三增”（《语增》、《儒增》、《艺增》）等篇。“九虚”批判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及神仙方术、长生不死之说；“三增”批判了《五经》、书传和文章中的夸饰之辞。《论衡》所破的是神学迷信，虚妄不实之言，所立的是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之论。

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以当时的自然科学作为理论的依据。譬如他说：“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论衡·治期篇》）。日月食在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思想支配之下，认为是大的灾异，皇帝要下诏罪已，甚至策免三公。王充根据天文学的知识证明日月薄食是自然现象，并且有规律可循，根本与人的行动、

政教得失没有关系。王充不仅根据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破除迷信，并且对当时的自然科学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建立了唯物主义天道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就这方面看来，可以说王充哲学是古代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知识结合的典范。

周桂钿同志这本《王充哲学思想新探》，着重探讨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其中《天论》部分论证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天道自然观的形成和它的重大意义。作者把先秦至两汉的天人关系学说的发展变化分为天命论、天人相分说、天人感应说、天道自然论四个阶段。从而论证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天道自然观的形成，是天人关系学说发展的新阶段。在《气论》中，作者对气的分析颇为细致。如举王充说的：“非物则气”。（《论衡·纪妖篇》）“非形体则气。”（《论衡·卜筮篇》）所谓的“物”是指有形体之“物”，所谓的“气”则是无形体者，可见古人对于“物”的理解，其内涵和外延是与现在不同的。本书中讲的王充《知论》，也即是哲学上的认识论。王充认为要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闻见。“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实知篇》）因此，他反对那种超感性的神秘力量，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的先验论。他说：“圣贤不能性（生）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同上）认识必须通过耳目等感觉器官，但认识是否正确，单靠感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说：“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篇》）他指出认识的是非不仅要依靠感觉，还得通过思维来判断。王充提出效验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考

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论衡·语增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对作篇》）简单地说就是要以效验、事实做为检查认识的标准。要是没有效验和事实根据，虽然说得十分动听，也不能使众人相信，所以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篇》）

在知识的来源上，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说：“知物由学，学乃知。”“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论衡·实知篇》）他强调学问的重要性。在学问上，王充又主张博通，反对那些抱着一本书，株守一先生之言的儒生、博士。他说：“通人胜于儒生。”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也。”（《论衡·超奇篇》）学问贵能博通，博通的目的又在于能应用，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本书作者在《知论》一章中，除了探讨知的内容，获得知识的途径，知的验证而外，还列出了《知要博通能用》及《知为力》两节，专门进行探讨，也是值得注意的。

周桂钿同志从余问学，每有所作，必就商讨。他勤学而好思，所撰《王充哲学思想新探》颇有心得，不落一般窠臼，可为治汉代哲学史、思想史者参考。有的人对青年科学工作者写的东西总不大放心，认为这不能算成熟的作品。其实科学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学术研究也必然是后人胜于前人，这是发展必然的总趋势。最后，我引鲁迅的两句话作结：“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钟肇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六日

于北京弓弦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

目 录

序.....	钟肇鹏
第一章 王充及其《论衡》的历史命运.....	(1)
一、升擢与废退.....	(1)
二、毁誉见高明.....	(7)
(一)从赞誉看社会价值.....	(7)
(二)从诋毁看历史意义.....	(9)
三、起落知世风.....	(22)
四、王充及其《论衡》的彻底解放.....	(27)
第二章 王充天论.....	(29)
一、天是自然物，不是神.....	(29)
(一)天文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	(29)
(二)“天”不是神.....	(37)
(三)迷信“天神”的根源.....	(41)
二、日月行有常度，不为人变改.....	(47)
(一)关于日月出入问题.....	(47)
(二)关于日远近问题.....	(51)
(三)关于日月形状问题.....	(52)
(四)关于日食问题.....	(56)
三、天地有限与宇宙无限.....	(60)
四、天人关系学说发展的新阶段.....	(63)

(一) 天命论	(63)
(二) 天人相分说	(68)
(三) 天人感应说	(71)
(四) 天道自然论	(77)
五、王充天论的科学成果和哲学意义	(84)
第三章 王充气论	(93)
一、气是什么	(93)
二、气的分类	(97)
(一) 元气	(97)
(二) 精气	(102)
(三) 和气	(109)
(四) 光气	(112)
三、气的作用	(116)
(一) “气自然”论	(116)
(二) 气在人体中的作用	(126)
(三) 人生性命皆由气	(138)
(四) 天下治乱也因气	(146)
四、气论的几个矛盾观点	(148)
(一) 关于人性问题	(149)
(二) 关于圣人问题	(150)
(三) 关于历史发展问题	(153)
(四) 关于贤君的作用问题	(154)
五、王充的气论思想和哲学体系	(155)
六、王充的宇宙观	(158)
(一) 王充的宇宙观不是气(元气)一元论	(158)
(二) 天地是宇宙本原——汉代宇宙观中的一家	(166)

第四章 王充知论	(175)
一、知的内容	(175)
二、获知途径	(181)
(一)感知	(181)
(二)思知	(184)
(三)学知	(192)
(四)事有不可知	(195)
三、知的验证	(196)
(一)以实验之	(196)
(二)以道论之	(204)
四、知要博通能用	(211)
五、“知为力”	(217)
六、王充知论体系的成就与局限性	(222)
第五章 王充哲学思想的来源	(225)
一、杂采诸子自成一家	(225)
(一)属于儒家吗?	(225)
(二)属于道家吗?	(237)
(三)是杂家吗?	(239)
二、积极吸取科学成果	(246)
三、注意总结实际经验	(253)
(一)“虫之种类，众多非一”	(256)
(二)“虫生有日，虫灭有时”	(257)
(三)“含气而生，开口而食”	(258)
(四)“令禾不虫”	(258)
后记	(264)

第一章

王充及其《论衡》的历史命运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生，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逝于家中。王充是东汉时代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杰出的无神论者。他著书多种，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论衡》今有篇目八十五，《招致》一篇有目无文，实存八十四篇。这是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资料。

王充一生的坎坷经历和《论衡》一书的褒贬遭遇都是值得研究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使我们了解王充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解以及对思想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升擢与废退

据王充自述，他的祖父王汎、伯父王蒙和父亲王诵都是“任气”的人^①。这种家庭也许在先天和后天方面对王充有某种影响，使王充的思想、性格，从小就与众不同。乡间的一般小朋友都喜欢抓麻雀，捕知了，或者玩铜钱，爬树，王充“独不肯”。他跟其他小孩玩时，也不喜欢随便打闹。看

① 《论衡·自纪篇》。以下凡引《论衡》，只在文中注篇名。

来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属于思维型的。王充似乎有点成熟过早，当他六岁上学的时候，就有“臣人之志”，象成年人那样“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似乎那时就已经没有小孩子的稚气了。“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既没挨过父亲的打，也没受过母亲的骂，乡里的人也没有批评过他（以上引文均见《自纪》）。因此，王充少年时在家乡有“乡里称孝”^①的好声誉。他后来读的书日益多了，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才高而不尚苟作”，不随便写文章，一旦写起文章来，则“援笔而众奇”（《自纪》），常常博得许多人的赞赏。每当他提出一种新见解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种怪论，不合时俗，但是如果认真地听他把话说完，大家又都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写文章也是这样，“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自纪》）。由于博学高才，他得到一些人的赞赏，也当过几任小官。起初在县当过“掾功曹”，相当于现在人事局管人事的属官，后来在郡都尉，即军事长官的府里当“掾功曹”，又在郡的行政长官太守那里当过“五官功曹行事”，还被州刺史董勤征聘为“从事”，“后升为治中”，协助刺史负责监察扬州所属的丹阳、九江、庐江三郡的政事，这是王充一生中当过的最高属官。

仕途不遇可能是成就他为伟大思想家的因素之一。他在哲学上反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在学术上看不起当时“守信师法”和专经的儒生；在思想上，他又反对“独尊儒术”和神化孔子，提倡博通诸子百家。他“为人清重”，“不好苟交”，“非其人，终日不言”（《自纪》），讨厌官场上那

①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

种阿谀奉承、拉拉扯扯的庸俗作风。“在乡里慕蘧(gū渠)伯玉之节”，不肯违背自己的主张去追求利禄。由于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原因，他在官场上很吃不开，受到多方排挤。一方面，他“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结果是“言不纳用”（《对作》）。上司不采纳他的建议。另一方面，同僚们又“因其微过，蜚条陷之”（《自纪》），抓住他的微小过失来攻击他。王充究竟有什么“微过”呢？在《自纪》篇没有明确提到，但从《程材》篇似乎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小毛病，诸如：“时或精暗不及，意疏不密，临事不识；对向谬误，拜起不便，进退失度；奏记言事，蒙士解过；援引古义，割切将欲；直言一指，触讳犯忌；封蒙约缚，简绳检署，事不如法；文辞卓诡，僻刺离实，曲不应义。”就是说，有时办事不熟练，有些事考虑不周密，有时碰到一些事，在对答酬中发生一些错误，或者违背某种礼节。有时起草文件，有书生气，引用一些典故不合适，或者不符合上司的口味，或者不够婉转，触犯了忌讳。有时说的话或写的文章，在别人看来很乖僻，违反官场通例。有时在办理一般事务的时候，没有遵照既定的规章制度。总之，就是说“儒生不习于职”，对处理行政事务显得很不熟练，经常出现差错，因而被“世俗轻之，文吏薄之，将相贱之”（同上）。结果是“贬黜抑屈”，“仕数不耦”（《自纪》）。

王充有异端思想，因而不容于世，“伟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声”（《累害》）。在多方排挤之下，他以为只有朝廷才是最英明、最公正的。他把朝廷理想化，并寄希望于朝廷。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写了《须颂》之篇，认为应该歌颂朝廷和皇帝，把“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作为

自己奋斗的一个目标。他说：汉朝“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就是说汉朝有许多功德，没有得到应有的歌颂和宣传，被人看成很一般的样子，责任就在于当时儒生不从实际出发论说古今。王充认为汉朝比古代盛世周朝还要兴旺发达，是空前的太平盛世。但是，“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须颂》）儒生只相信久远的“虚美”，对汉代现实却不歌颂，为此，王充写了一系列文章加以批驳。同时他还写了一批文章歌颂汉代功德，“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他写《宣汉》等篇，竭力歌颂汉德，认为汉德“实然乃在百代之上”（同上）。所以，他把朝廷看作“家”，把汉朝的历代皇帝看作“祖宗”。王充极力表白自己的著作是歌颂朝廷的，迫切希望被朝廷所了解。他说：“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对作》）古代有派人到民间去收集诗歌的，目的是为了解民情风俗，所以说《诗》产生于民间。王充认为他的著作《论衡》和《政务》等也象《诗》一样作于民间，希望朝廷也会派人去收集，这也就是他写《论衡》的政治目的。王充还非常羡慕董仲舒等人有对策的机会，“能建美善于圣王之庭”（《别通》），在朝廷上回答皇帝的策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遗憾的是，自己“抱其盛高之力，窜于闾巷之深，何时得达？”（《效力》）他深感怀才不遇，希望有大官来推荐。

他，并且认为，没人推荐，即使是“文章滂沛”的文儒，“亦将弃遗于衡门之下，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乎？”《效力》“麒麟须献，乃达阙下。”（《状留》）可惜的是，大官有眼不识泰山，“长吏不能知贤”（同上），使他流落在“古荒流之地”（《须颂》），远离朝廷。这样，皇帝即使有“垂日月之明”，他却因“处在中州，隐于百里”，不能直接听到圣音，无法了解真实情况，而没办法歌颂圣德，等到诏书传到的时候，再去歌颂，那就差多了，“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最大的功劳，最好的美德都可能没有歌颂到。怎么办才好呢？最理想的是让他到台阁去做官，象班固、贾逵那样，离皇帝很近，“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同上）歌功颂德，一点也不会遗漏。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王充对汉朝歌颂的政治目的，是希望通过歌颂，使朝廷了解他、任用他。这说明他是愿意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充当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的。说他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思想家，认为他对汉朝的歌颂仅仅是为了“可以免于罪”（《对作》）的说法，似乎不符合王充的思想实际。

我们认为，王充在政治立场上与封建统治者是基本一致的，在思想路线上有一定的差别和矛盾，所以，王充思想和当时统治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斗争。正是由于这种斗争，使他被“弃遗于衡门之下”，流落在“古荒流之地”，成了报国无门的草莽之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他不遗余力地歌颂朝政，他还是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以至“年渐七

十，志力衰耗”^①，“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自纪》），始终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的垂青。可见，违背统治阶级思想的哲学家摆脱不了被遗弃的命运。但是，闪光的思想并没有被无知的非难、恶意的笑声所淹没，终究会得到知音者的赏识。据说当时同乡友人谢夷吾曾经上书推荐过王充，说他才学“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②。谢承在《后汉书》中说他“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死后一百年左右，吴国虞翻说他“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③同时，《论衡》也成了珍贵的“异书”，争相阅读。大学者蔡邕和会稽太守王朗读了《论衡》以后，才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此后，王充的《论衡》才得到广泛的流传。

王充一生没做过大官，也没有什么名望，他的思想受到压抑，他的著作不被重视，几乎湮灭。他死后，却是身价百倍，名声大震。而当时有些位高禄厚、不可一世的人物，死后却是“身与名俱灭”，甚至遗臭万年。在中国历史上，这类现象并非少见。尤其是创立思想体系的、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生前很少是得志的，不知是因为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就要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打击和排斥呢，还是由于当了大官、有了名望，就创立不了新的哲学体系！

①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

②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李贤等注引《谢承书》。

③ 陈寿《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

二、毁誉见高明

《论衡》一书的价值，可以从历代学者的赞誉和诋毁中，即客观的社会反映中，得到说明。

(一) 从赞誉看社会价值

有些学者对王充及其《论衡》备加赞赏。除了上述谢夷吾、蔡邕、王朗、虞翻、谢承等人外，晋代葛洪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称王充“冠伦大才”^①，又引谢夷吾(尧卿)的话说：王充是“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②。他说：蔡邕见到《论衡》，“叹其高文，度越诸子，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③。有的人认为王充《论衡》文多，“以多为贱”。葛洪在《喻蔽》篇中痛斥这种说法，用诗一般的语言，热情洋溢地赞颂《论衡》，他说：“玄圃之下，荆华之巅，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积而成山，夜光焕而灼天，顾不善也？”那些出产宝玉的地方，宝玉堆积如山，那些出产珍珠的地方，光亮照天，那有什么不好呢？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了《后汉三贤赞》，王充就是其中之一。据说，韩愈的性有三品的说法也是继承了王充

① 《抱朴子·喻蔽篇》。

② 《北堂书钞》卷一百注引《抱朴子》。

③ 《太平御览》卷六一七引。